

● 沈固朝

民众图书馆的现代意义 ——读李小缘先生的《民众图书馆学》

摘 要 李小缘先生认为民众图书馆与公共图书馆是有区别的。民众图书馆特点有三:民享,即全民共享;民智,是开化民智;民助,即全民参与帮助图书馆建设和管理。当年《民众图书馆学》批评的缺乏民众服务意识现象今日仍然存在。因此,提倡民众图书馆对于当今弘扬图书馆精神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参考文献7。

关键词 《民众图书馆学》 民众图书馆特点 现实意义 图书馆精神

分类号 G250

ABSTRACT Li Xiaoyuan thought that civilian's library is different from public library. A civilian's library is shared by all civilians, used by all civilians for the 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developed and managed by all civilians through their participation. The lack of awareness to serve civilians still exists today. Therefore, the author thinks it still has realistic significance to promote civilian's library and library spirit. 7 refs.

KEY WORDS *Civilian's Library Science.* Characteristics of civilian's library. Realistic significance. Library spirit.

CLASS NUMBER G250

民众图书馆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现象,在“公共图书馆”概念引进中国社会以后,这两个术语常常并用或交互使用。李小缘先生对民众图书馆的研究,反映在他的《民众图书馆大纲》(1927年江苏大学民众教育学讲义)、《民众图书馆讲义》(1928年中央大学暑期学校油印本)中。在顾炳松整理的李小缘先生讲义《民众图书馆学》(中央大学民众教育学院教育学术演讲汇编,1928年)中,“公共图书馆”与“民众图书馆”是同时使用的两个术语,但李小缘先生对后者有单独的表述。今天重提这个概念,不仅仅只是为了纪念这位最早研究民众图书馆的图书馆学家诞辰110周年,而是在于它的现实意义——在人人享受公平的图书馆服务尚未得到制度和法律强有力保障的今天,值得在我们将它从隐含在“图书馆”和“公共图书馆”的概念中剥离出来,加以放大和解读。

李小缘先生所处的时代,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时期,是归国知识分子将教育救国、启迪民智、唤醒民众为己任的时期。包括洪有丰、刘国钧在内的图书馆学家把欧美图书馆的模式和经验搬到中国来,推进了新图书馆运动。据有关文献报道,到20世纪30年代初,名为民众图书馆的有“一、二千所”^①。

徐旭先生对民众图书馆的解释是,“民众”虽为“全民”之意,如国立图书馆、省立图书馆都是为民众而设,但实际上,这类图书馆的主要工作侧重在“国家文化的宣扬和各省特殊文献的发扬,在水平线下的大多数民众,还不能去享受图籍上所载的高深的知识”。因此,民众图书馆事业的

象,是以知识程度在水平线以下的大多数民众为主体,是民众教育的重要工具,也是促进图书馆大众化的新兴革命运动和改造图书馆的必有程序。徐旭的这一思想,发表在他1935年出版的《民众图书馆实际问题》一书中,而在此之前七八年,李小缘先生就指出,“适于民众程度者称为民众图书馆”;“民众图书馆者,即促进民众教育图书馆也”;“传播文化,鼓吹教育,皆以民众为使命”。

李小缘对民众图书馆的论述,其特征可总结为三点:民享、民智和民助。

民享,即民众图书馆为全民共享,“无论士农工商、男女老少、贫贱富贵的人,都很欢迎去看书,没有阶级的分别”。在“民众图书馆方针”一章中,李小缘特别强调保障自由开放。作为从美国学成归国的学子,他当然看到在文化教育落后、人本意识淡薄的中国办“自由开放”的图书馆可能会遭遇遇到与美国完全不同的境遇,“每每有不公德的事体发生”。但他并不认为因有窃书行为或随地吐痰而要限制读者的权利,而是主张“指导员着力设法阻止,用精神服务补充纸面之广告,来提高公共道德”。对于“精神服务”的解释,李先生认为,一是图书馆员“以身作则”,二是“以我就人”,三是“和蔼”,四是“诱导”,五是“适应各人的需求及提其兴趣,最后才是维持秩序”。

民智,就是开化民智。李小缘在讲义中开宗明义:“图书馆即是教育”,图书馆的“根本的观念在辅佐教育之不及;并且为未受教育的得到受教育的机会”。他指出,凡“种种环境,能增进人的智识,改良人的行为的,这皆是广义教育。

① 徐旭. 民众图书馆实际问题. 中华书局,1935年:1

图书有这样的效能,美国视图书馆为教育重要的机构,称之为“平民学校”,又称之为“平民大学”;“要使教育机会均等,唯有广设公共和民众图书馆”。

民助,就是民众参与和帮助图书馆的建设和管理。李小缘建议将各种图书输送至各地,供人阅览,谓之“巡回文库”。巡回文库可分为学校巡回文库、会所巡回文库、茶肆巡回文库、寺院巡回文库、家庭巡回文库等。他主张学校巡回文库由“公举相当之人为指导员”负责管理;茶肆巡回文库以店主为管理员,家庭文库“以一村之稍具品学之人家设立之,以其家主为管理员”。他还认为,民众图书馆的馆长必须是对民众教育有研究者。而流通部的管理员必须具备民众化、以我就人化的精神。

在李小缘先生看来,在民众中设立小型的图书馆,其意义远大于设立若干大型的公立的公共图书馆。他以民众图书馆是精神娱乐的最高俱乐部为例,认为人生不能无娱乐,而下层百姓,包括工厂之工人、在家庭烧茶煮饭的少妇老嫗、无业游民,其消遣方式往往是看戏、赌博、饮酒,或寻花问柳等。要杜绝下等娱乐之弊,可在工厂的专门图书馆添置游记、传记、戏剧、小说等通俗书籍,工作之外,即到图书馆借书看书;看过了戏,可以借戏台上所演的戏书。总之,要将图书馆变成这些人的最高俱乐部,要使“上图书馆借书”变为家庭妇孺日用口头名词,与每日必须“上街买菜”同样重要。李小缘先生认为发达的小图书馆之事业,其总合将超过大图书馆。十年之后,小图书馆建筑之勃兴,有如旧日“土地庙”之多,使人人有读书识字之机会,则教育普及之机会亦愈大。这种创办一大批老百姓身边的图书馆的设想,无疑是他的民众图书馆思想。它对于今日如何提高全民文化素质、如何使读书运动抵消麻将盛行、赌博成瘾、吃喝成风、迷信抬头带来的消极影响,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可以看出,李小缘先生并没有将公共图书馆与民众图书馆完全等同起来。在他眼中,读者、皮匠、铁匠、小工、瓦匠、木匠、学生、住家的、有钱的、无钱的都是图书馆的读者。从理论上说,公共图书馆应面向社会所有阶层,但它所强调的“公共、公开、共享”,要求在服务过程中实施无等级差别服务、无身份界限服务和无歧视服务,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做到,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也很难做到。“不得携带僮仆幼孩”和阅览收费仍是当时许多公共图书馆的规定。李小缘曾建议省立图书馆要向特殊群体提供服务,如设立监狱部、医院部、盲人读书部、儿童部等,在当时以及后来都未能实现。图书馆,特别是公共图书馆不热心于为平民服务而热心于为某一群体(如知识群体,或某一时代有话语权的强势群体)服务是一个老问题。李小缘称“吾国向无公共图书馆”,反映了他对早已成立的省立公共图书馆受旧式藏书楼影响的不满。他认为,中国图书馆,新旧分别太深,其旧者积重难返,不易改良,新者抄袭模仿,不切实际。他所批评的挂于图书馆门首的虎头牌“书籍重地,闲人莫入”,仍然可以在今天的许多图书馆阅览规则中看到其各种翻版。

公共图书馆是一个舶来品,是西方民主政治的产物。它的传入正值中国处于清末民初,要在当时专制政治的环境和重重社会等级枷锁中发育成长,必然是极为困难的。将封闭、保守的旧式藏书楼改造成开放、免费、公平服务的现代图书馆,需要走很长的路。据《湖南图书馆百年史略》的记载,

新式图书馆建成后,来馆阅书者仍多为上层社会的士人,平民因交不起卷资只能望而止步。男女尚不能同室阅览,更遑论社会阶层的差别了。公众中的社会强势群体,可以现利用公平或倾向于使强者更强而弱者更弱的制度。因此,要有效地实现公共图书馆的公平性服务,就要采取有利于社会弱势群体获得平等机会的措施。作为新图书馆运动的提倡者和实践者,李小缘研究专为不能享受平等的平民百姓建立图书馆——民众图书馆,可能就是基于这样的考虑。

为打破民众远离图书馆的状况,图书馆工作者(包括归国学子)投入了巨大的热情,积极倡导“书籍到民间去”,使“民众”这一概念逐渐成为图书馆学理论和图书馆实践的核心。当时提出的口号是:“使全国民众,无论男女老幼,皆有识字读书之机会”;“省内或市中人民得享受不纳费而阅书之权利”;“无宗教之异,无国籍之分,无阶级职业之别,无男女老幼智愚贤不肖之殊”。他们的办馆思路是:如何引起社会对图书馆的同情?图书馆的信仰和精神何在?如何使社会人士领悟到图书馆的重要与急需?他们所采取的措施是:在环境设计上,民性趋便,简则易从,喧闹不闻;在书籍选购方面,以民众为标准,特别是偏重搜集与流通普通浅易有价值之书籍;在组织措施方面,设学校部、盲人部、儿童部、讲演部、农民识字处、问字处、代笔处,设立农民参考部等;在阅读指导方面,举办演讲会、放电影、图书展览、民众读书的荣誉奖励、巡回书库等,在管理方面,主张“多种规则,要在不妨碍公众便利上,取最宽大主义”。即便在推销图书馆服务,也是不遗余力,从下面的几则图书馆广告可以看出,其宣传的要旨是鼓励民众像进入“茶楼酒馆”一样地进图书馆。

“图书馆是为你们每人预备的地方;爱研究学术的,请进来!爱看新鲜小说和有趣味的图画杂志的,请进来!想知道时事和解释疑问的请进来!想求清静读室和精神愉快的,请进来!”

“民众图书馆是万事的问津处!”

“民众图书馆是高尚的娱乐场!”

“要进德修业请到民众图书馆去。”

“要宽裕生计请到民众图书馆去。”

“借阅图书是民众的权利!归还和爱护图书是民众的义务!”

“民众图书馆是最好的消遣场所。”

……

20世纪中国的民众图书馆是一个有别于西方公共图书馆发展史的不容忽视的现象,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它的兴起,是与中国民众的知识启蒙与文化教化运动结合在一起的。民众图书馆和巡回书库的借阅对象主要是民众学校成年班、青年班和儿童班的毕业生或在校生,以及乡村小学的师生。为了指导农民读好书并提高他们的阅读兴趣,民众图书馆和巡回书库还组织农民举办各种读书会、讨论会。因此与民众图书馆相伴的另几个术语是“民众教育”“民众学校”“民众识字社”“平民图书馆”等。李小缘先生不仅论述了建立民众图书馆的意义、作用,还就如何建立民众图书馆讨论了方针、组织形式、经费预算方案、管理员资格等。今天,民众图书馆已经成为一个历史的概念了,但它没有失去在21世纪的现实意义,它甚至比公共图书馆更鲜明地体现了图书馆的本质属性及其核心价值,它代表了广大公众希望获得共

享、公正、公平地使用图书馆服务的理想,反映了我们一直在热烈讨论的公共图书馆精神。我们之所以把它看作是21世纪新图书馆运动的历史先声,是因为当年李小缘等新图书馆运动的先驱所批评、所反对的现象至今仍然以不同形式、不同的理由、程度不等地存在着,仍值得认真加以研究。例如:

图书馆所宣传的“差异”服务(如“为领导决策服务”、“为重点企业用户服务”、“大型科研项目优先服务”等)仍具有热烈的拥护者;

读者的权利遭到漠视,图书馆利用中的学科歧视、教育程度歧视现象仍大量存在,残疾人、病人、犯人等一些特殊的服务对象不仅仍难以享受特别的服务,甚至难以享受图书馆的常规服务;

禁忌多于诱导,惩罚多于教育,硬性管理手段为主,人文关怀和人文援助缺失;

借阅所需证件的有条件发放构成“有条件服务”;

高校中院系图书馆互相封闭,部分阅览室只对特殊的学生群体开放,作为“校园民众”的低年级读者很难享受与高层次学生或教师一样全面、优质的服务;

三大图书馆系统,条中有块、块内有层,分灶吃饭,各自为政;

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无论是“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阶级划分取代对读者需求的划分,还是科教兴国时代,对知识拥有的强者给予更多关注,知识、信息和经济的弱者常常被漠视。“公共图书馆”与高校图书馆和科学图书馆的区别仅是经费来源不同与服务对象的差别,“公共”二字往往徒有虚名。

今天,我们正处于100多年前类似的社会转型期,也经历着第二次新图书馆运动。巧的是,这次运动的主旨竟然与80多年前非常相似,不同的是80多年前的那场运动强调图书馆的社会教育功能,以引进和创办现代图书馆为主,这次运动所处时代背景的最主要特点是,法制正在社会各领域建立规则,社会的公共事业正在受到公众的普遍关注,暴露出来的弊病受到社会舆论的质疑,一些“图书馆事件”的曝光已说明了这一点。人们已经认识到利用图书馆来实现自己的信息自由权利,是自己本应享有的基本权利。近几年公共图书馆精神的讨论,把“图书馆是实现社会平等的一种设施”的观念引向了理论研究的核心。因此,今天的新图书馆运动要解决的,不仅是城市、大学和专业图书馆的升级换代,更是图书馆事业的方向和定位问题——如何向普通公众敞开大门,如何在老百姓的生活中发挥更大作用。

1972年和199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公共图书馆宣言》,指出公共图书馆是开展教育、传播文化和提供信息的有力工具,也是在人民的思想中培养和平观念和丰富人民大众精神生活的重要工具。根据这一精神,图书馆能否实现为民众的服务,已经不仅仅是单纯的图书馆管理问题,而是反映了图书馆在实现现代民主政治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是对迅速觉醒的公众的权利意识做出何种回应的问题。作为人类自由获取知识的公共设施,平等地获得图书馆的知识服务是民主社会中每个人的基本权利。而图书馆能否争取让读者具有平等地获得知识的权利,平等地享有各种

资源和精神娱乐的权利,平等参与管理的权利,平等享有提问的权利等等,关系到保障公民信息平等和享受社会教育权利的问题,关系到对图书馆本质的准确把握和图书馆价值的追求,关系到社会公众对图书馆的看法。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重提“民众图书馆”既是一种历史的回归,也是公共图书馆精神在图书馆社会实践上的落实。没有为社会底层民众的服务,没有对知识和信息的弱者的扶助,高扬公共图书馆精神恐怕只能流于空谈。

当然,图书馆是社会的一部分,它的许多做法受制于社会制度、价值观念、文化形态和教育政策等因素的影响。但不管何种类型的图书馆,开放、平等、免费,始终是国际图书馆界认同的一种精神,亦是中国图书馆人共同追求的职业理想。如何从管理与制度层面把此种精神落实到实处?我赞成“走近平民”,赞成各种“分馆—服务站”、“社区图书馆”、“图书馆之城”、“读书基地”等拓展服务、延伸功能、贴近公众的办馆模式和理念,尤其是向欠发达地区和底层民众延伸的各种流动图书馆模式。这并不是说,高校和研究型图书馆也要办面向打工者的图书馆室,而是说在高校系统中也有公共图书馆在社会公众环境之中面临的同样的问题,需要我们去正视,因为即使在校园里,我们还远没有解决公平、自由地提供无歧视的服务这一问题。

需要再次强调的是,弘扬“民众图书馆”精神有许多具体问题要解决,如平等服务与重点服务的关系,资金局限与收费与否的问题,小型图书馆向乡镇区县推进的模式问题,信息资源共享问题等,对机会均等和差别服务如何客观评价的问题,这些历史积淀下来的问题不可能在短期内解决。如果我们像李小缘先生一样,不尚清谈,不图近功,实事求是,认真严谨地从方针、政策、组织、管理等出发来考虑服务民众的问题,就一定会有实际的效果。

参考文献

- 1 范并思. 图书馆精神的历史缺失. 新世纪图书馆, 2004(6)
- 2 杨文祥. 从公共图书馆精神到21世纪新图书馆运动. 图书馆, 2005(2)
- 3 尚海水, 周进良. 《公共图书馆宣言》之人文精神阐释. 图书馆建设, 2006(3)
- 4 陈文. 当代图书馆人的职业理想: 开放、平等、免费. 图书馆, 2006(5)
- 5 沈占云. 放宽公共图书馆精神之历史、现实的视界. 图书馆, 2006(2)
- 6 杨光武. 公共图书馆精神的春天——公共图书馆精神与社会民主化进程. 图书馆, 2006(4)
- 7 马先阵, 倪波. 李小缘纪念文集.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1988

沈固朝 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主任, 教授, 博士生导师. 通讯地址: 南京大学. 邮编 210093.

(来稿时间: 2007-08-27)